

我的两会，2015

——科技日报记者手记



态度

王延斌

“请问刘市长，前天我听到咱们市一个企业反映情况，他们要建一栋办公楼，至少交95种税费盖192公章，您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代表，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”

“这个嘛，情况我还不了解。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市在过去一年的努力。一年来，我们贯彻中央和省省委政府的简政放权的要求，做了大量简政放权的努力，第一……（此处省略一千字）”

这是某省代表团开放日，记者与某市领导的一段对话。记者的问题是冲着市领导去的，希望得到一个地方当政者的直接答复。但市领导显然“聪明得很”，把问题绕过去，“习惯性地”首先赞颂省领导的英明，其次表达出自己的努力，最后表明自己的决心。

同样是地方主官，有人“躲”，有人就敢面对。浙江团媒体开放日，温州市市长陈金彪代表“自揭家丑”，痛批自己辖区内的“审批”难题依然存在，摆事实、列数据、讲道理、给建议，比起那些“玩太极”的市领导，陈市长的坦率令人印象深刻。

国家在进步，国情在改变，从初期的“浅水区”到如今“深水区”，我们要改革，要敢于啃硬骨头，以更高的智慧和更大的魄力推进各项改革进程，将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中。其中，地方主政者敢于直面问题的坦率非常重要。因为在一个上行下效的行政体系中，只有地方“一把手”敢于直面问题做表率，才能带动整个体系负起应付的责任。

但在会场上，记者发现，还是有一些人停留在过去的思维中，开口闭口讲成绩。问题找不出来，或不去找，不愿找，让他们的发言在这个场合失去了意义。

希望“刘市长们”走出“传统思维”，并期待更多陈市长的出现。



与诚信相遇

杨雪

在人民大会堂为政协开幕侧记“撒网式”搜集采访素材时，“逮到”一位彬彬有礼的香港人——林云峰委员，香港建筑师学会副会长。匆忙中交换了名片，我以“守柱勿纵”的心态请他来提案。

两天后，我真的收到了林先生的邮件，用不太标准的国语发了两个繁体字提案，并有专门写给“杨小姐”的详细说明。权衡了一下，我知道这种软科学的内容很难在选题会上引起编辑们的兴奋点，但我认为必须尊重这份诚信。来回七八条短信之后，约好下午2点在驻地采访。

1点20分我就到了，林先生特地下楼把我从一层大厅带到三层咖啡厅，坚持要请我喝杯东西。采访中，他用普通话说不准确的词，就亲自在我的笔记本上写出来。2点50分采访结束，他又送我下一楼大厅，然后才上楼参加小组讨论。

“方老师您好！我是科技日报记者杨雪，想采访您关于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相关问题。”编短信的时候我再三犹豫，方新代表是中科院党组副书记，但我最终决定叫她“老师”，亲切。几分钟后我收到了回复：“今天下午三点人民大会堂西厅，北京团开放日，我有发言，关于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，欢迎你来。”我有些懵，真的很亲切。

2点10分，我已经坐在北京团的记者席上，突然接到同事电话：“方新老师刚才打电话告诉她下午不发言了，但一时找不到你电话，赶紧想办法通知你，就找我这儿来了，你快给她回个电话吧。”

方老师得知我已在场等候，到达的第一时间就联系我，于是我得到了开会前15分钟的宝贵采访时间。



“国是”还是“己事”

张佳星

时不常会想起吉永华委员在小组会上倡议委员转变视野，不论己事论国是。“不要总关注一些项目能不能上，不要总抱怨‘我提了建议怎么没照着做啊’，要提出有前瞻性的意见。”

“顾眼前”在委员来说不是少数，好听一点是论“国是”，实际上是论“己事”，大段的套话之后，实际上是在以自己的利益角度要政策倾斜，要资金投入、要媒体关注……

听妈妈讲那两会的事情

房琳琳

宝贝，这十多天妈妈忙碌的“上会”经历很有趣。睡觉前，我来讲给你听，好吗？

中国有很多很多人，来北京开两会的几千人来自地图上不同颜色的块块。来干什么呢？一是听一听中国这一年发生了哪些故事，二是商量一下，有哪些办法可以让咱们在明年还有更远的将来过得更好。

记得一个被妈妈叫做“总理”的人，在电视机里对着话筒讲了好长好长的故事吗？你可能听不懂什么是“政府”“报告”“回顾”“部署”，但你知道“工作”“对吗？”



科技日报两会记者“全家福”。

本报记者 刘亚东摄

蹲点在政协科技界，有一种痛叫“不作为”。跟一位跑“科口”的小同行调侃：科技界真乃世外净土，记者们肤浅地想“搞个大新闻”，却总是搞不出来。

早上坐在去会场的车上，茫然。同僚短信问“今天抓谁？”，答曰“不知道”。像“巡视组”一样严肃地盯了一天。半夜两点回到招待所更衣之际不禁长吁短叹。从雪白的马桶转到雪白的床单，丢下手机打开电视求灵感，终于“人事不省”。

如果陈道明坐在地毯上改我的稿，那咱转载数也能轻松破百，不用吭吭唧唧写科技新闻了。看“量子纠缠”的读者，能比看明星绯闻的多吗？因此下午三点坐在会场里，眼皮耷拉着，便自我安慰道：“然今卒困于此，此天亡我也，非战之罪。”

偶尔把录音笔丢在座位上，像机会主义者一样蹑足走廊里游历一番，侧着身子蹭到正接受采访的委员身边，大多时候又侧着身子挪走。里外转悠到四点半，寒意渐浓。一条“鱼”也抓不到，空手回去，怎么跟老小交代呢？

今年两会显得早，年味还没缓过来，上会记者们就提前进入状态了。政协开幕前两天，我驱车来到科技界驻地——北京会议中心。正逢大批代表委员前来报道，驻地的安保防线格外忙碌。排队等待过程中，我放着空档，用手机偷闲与提前约好的委员联络；信息还没发出，只听duang的一声，抬头一看，竟与前面的一辆奥迪A6L“吻”了个正着。

下车与我交涉的司机是位年轻小伙子，由于后面排着很多等待进场的车，我们便匆匆留下电话没说些什么。接下来的一切显得非常戏剧化。原来，我撞的是中

放下手机，想到忙活了一天毫无收获，心里拔凉拔凉。作为一根自己都不清楚会上会次数的“两会油条”，这么残酷的现实还是第一次遇到，心里很难接受。手里关于高校基础研究的选题已经谋划了几天，采访了不少代表委员，一位我觉得很重要的代表却一直没采到。

除了想听听他的观点，今年1月底，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中还跟他谈到了高校基础研究的问题。这样的细节如果不加进报道中，总觉得有些遗憾。如果能获得他的电话当然是最方便的。我四处向同行打听，未果。

银行老总说要拯救多个河北某县农商行的呆坏账，很苦很累，很偏僻，什么风沙大、地儿荒凉。那难道不应该是本职工作吗？换个角度想，作为委员既然到了这么苦的地方调研，为什么不能提点建议为当地老百姓改善一下，却用珍贵的小组讨论时间叫苦、表功，还不忘再要点。

企业家说我们走出去有多难多难，需要政府扶持。商海沉浮，本来就是“要敢拼才会赢”，搭了政策的

来水喝了会肚子疼，要喝纯净水。你看，两会上的很多事离你并不遥远，对吗？你在听妈妈讲睡前故事的时候常常追问“为什么”，却并不总能得到满意的答案。同样，两会上讲故事、出主意的人在面对妈妈的提问时，也偶尔会有躲闪或婉拒。

但宝贝，这可以理解，“中国故事”本来就很长很难懂，只要参加两会的大人回到地图上不同块块里努力“工作”，明年再相聚时，或许能带来咱们认可的

两会故事讲完了，宝贝，祝你今晚睡的香甜，妈妈希望两会承载的中国梦，在你懂懂的“长大”之时得以实现。

两会故事讲完了，宝贝，祝你今晚睡的香甜，妈妈希望两会承载的中国梦，在你懂懂的“长大”之时得以实现。

两会故事讲完了，宝贝，祝你今晚睡的香甜，妈妈希望两会承载的中国梦，在你懂懂的“长大”之时得以实现。



今天“抓”谁

高博

是我。人间尚存温暖，生活充满可能，借用葛大爷那句台词——“我又看见了，这是爱情的力量！”

我仿佛听到，编辑们在“村口”焦急地呼唤。迫不及待，我要一头扑在亲人怀里，扑向那盒肥而不腻的盖浇饭。走出会场，我的步伐像保尔一样轻快又坚定。

这个组里还有另外几位核方面的专家，你去问问他们吧！”他果然为人低调，寡言少语。

眼看采访进行不下去了，我笑着说：“我前两天撞了您的车。”

“我知道是一位媒体记者撞的，原来是你！”王寿君露出了交谈中少有的笑容。

“所以您一定要接受我的采访，您看我多有缘啊。”

念在我诚意十足，王寿君笑了。我俩坐在会议室外的椅子上，聊了起来。

还真没找到！直到下午的会议开始，我正式开始反思。上网仔细一搜，原来他调调工作后，今年加入了上海团。

颤颤地冲上海团驻地，各会议室已空无一人。新闻联络员手机关机，不在房间。值班室倒是有人，态度还挺好，却怎么也不肯透露代表联系方式。

这回我急了。上窜下跳过程中，意外看到了一张通知，大意是让代表去值班室领取纸箱打包行李。我又回到值班室，以期“守株待兔”。

这招果然管用，虽然没等到该代表本人，却遇到了他的秘书。我连忙上前说明来意。秘书很热情，答应转达，但说代表日程很满，马上出门，让我等答复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没有消息。我拨通秘书的电话，问有没有可能通过电话采访几分钟。对方表示代表决定不接受采访。措辞有礼，态度坚决。

放下手机，各种懊恼涌上心头。如果事先做足功课，如果别这么拖沓……“如果们”已成过去，眼前只有尴尬的结局。

两会是新闻战场。措辞有礼，态度坚决。郁闷的是，这次轮到当回了“负面典型”。



duang, “撞”上了委员

刘晓莹

核建总经理王寿君委员的车，而且他所在界别是我“死盯”的科技界；上网一查，他还是一位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委员。2015年，是中国核电重启的关键年，这送上门来的采访机会，让原本一直“卑微”致歉的我，“邪恶”地笑了。

为了在3月11日福岛核事故四周年这一天推出特别策划，前方报道组的几位记者分成n路采访核工业界的代表委员。我在小组讨论的间隙，“堵”住王寿君，

眼看采访进行不下去了，我笑着说：“我前两天撞了您的车。”

“我知道是一位媒体记者撞的，原来是你！”王寿君露出了交谈中少有的笑容。

“所以您一定要接受我的采访，您看我多有缘啊。”

念在我诚意十足，王寿君笑了。我俩坐在会议室外的椅子上，聊了起来。

还真没找到！直到下午的会议开始，我正式开始反思。上网仔细一搜，原来他调调工作后，今年加入了上海团。

颤颤地冲上海团驻地，各会议室已空无一人。新闻联络员手机关机，不在房间。值班室倒是有人，态度还挺好，却怎么也不肯透露代表联系方式。

这回我急了。上窜下跳过程中，意外看到了一张通知，大意是让代表去值班室领取纸箱打包行李。我又回到值班室，以期“守株待兔”。

这招果然管用，虽然没等到该代表本人，却遇到了他的秘书。我连忙上前说明来意。秘书很热情，答应转达，但说代表日程很满，马上出门，让我等答复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没有消息。我拨通秘书的电话，问有没有可能通过电话采访几分钟。对方表示代表决定不接受采访。措辞有礼，态度坚决。

群访变专访

王飞

都说两会采访需要点运气，4号下午我到昆泰饭店采访，就撞上了一个大腕。

工商联别会议室，百度CEO李彦宏的桌签赫然在列，没多一会儿，他准时出现了，无心插柳的暗爽感觉顿时涌上心头。

采到人最关键，我开始思考采访策略：据以往经验，会后堵人采访，不可控因素太多，如能提前约访，成功率或许高些。

我快速拟好采访提纲，然后又认真地抄写了一遍，随即走到他身边耳语道：“李委员，您好，我是科技日报记者，恭喜‘中国大脑’登上网络热词排行第一名！”

说完，我把手机上的搜索排名递给他看。他脸上有了笑容，我趁机把采访提纲放到他的桌上。

“会后就请您这3个问题。”

“好。”

小组会一结束，我就堵在门口，但周围记者和工作人员很快也蜂拥而上。

“李委员，我想问……”我刚提问就被人挤得一直后退。

“李总，我有个问题……”身旁其他记者的问题淹没了我的声音。

“对不起，李委员要休息，不接受采访，请让开……”工作人员奋力推开李彦宏身边的记者。

“没关系，我和科技日报记者约好了。”李彦宏转身看着我，然后停下了脚步。

嘈杂的会场瞬间安静了。啥也不说了，心里满满的傲娇。

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，第三个问题，5分钟时间很快过去了，在同行的“怒视”下，李彦宏仔细地回答了我的所有提问。

采访完毕，旁边一个认识的记者朋友走过来开玩笑，“群访变专访了。”我呵呵一笑，决定从此“路转粉”，原因嘛，你懂的。



改革ing

盛利

为期10天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5日闭幕。连日来，代表们透过议案、建议、大会发言、小组讨论等方式畅所欲言，共商国是。采访中记者看到，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，代表们更多把目光聚焦在“进程中”的改革，不再“高谈阔论”，而是“掷地有声”，紧密结合自己所见所闻、实际问题，谈思路、提建议。

“简政放权”，理清政府、市场“两只手”的关系已是共识，但政府“放手”后，监管职能如何转型？山东省省长郭树清代表提出，削减行政审批不是“为减而减”，政府部门工作习惯、工作理念和方式方法亦需转变，梳理部门职责划分不清、职能重叠交叉，也是改革重点。

“互联网+”等新兴产业亟待推进认识一致，但其发展中的产业超前、监管滞后如何应对？

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代表认为，需要从顶层设计层面制定国家“互联网+”发展战略，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，强化部门间协同监管，实现快速响应、联动处置，形成融合市场的监管合力，营造良好政策环境。

深化科技改革正在加快推进，但科技项目管理、科技成果转化、科研人员考核评价等政策、制度重构中，还有哪些细枝末节，盘根错节需要打通？

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代表聚焦“政府不再直接管理项目”后，第三方专业机构约束机制的问题；科研一线的宜宾学院教授魏琴代表则瞄准了科技项目申报，“预算”设计的不合理。

无论是加强环保、完善社会福利，还是提升医疗服务水平、缩小城乡差距等，面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，聚焦“改革进程中”的改革，代表们正用自己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，以更大的决心、勇气、魄力和更高的智慧，攻坚克难，推动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。

（扫一扫本版二维码，看相关记者两会报道）



看看拍得怎么样。

本报记者 刘亚东摄